

# 苏轼文集卷四十三

## 论

### 孟轲论

昔者仲尼自卫反鲁，纲罗三代之旧闻，盖经礼三百，曲礼三千，终年不能究其说。夫子谓子贡曰：“赐，尔以吾为多学而识之者欤？非也，予一以贯之。”天下苦其难而莫之能用也，不知夫子之有以贯之也。是故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之法度礼乐刑政，与当世之贤人君子百氏之书，百工之技艺，九州之内，四海之外，九夷八蛮之事，荒忽诞谩而不可考者，杂然皆列乎胸中，而有卓然不可乱者，此固有以一之也。是以博学而不乱，深思而不惑，非天下之至精，其孰能与于此？

盖尝求之于六经，至于《诗》与《春秋》之际，而后知圣人之道，始终本末，各有条理。夫正化之本，始于天下之易行。天下固知有父子也，父子不相贼，而足以为孝矣。天下固知有兄弟也，兄弟不相夺，而足以为悌矣。孝悌足而王道备，此固非有深远而难见，勤苦而难行者也。故《诗》之为教也，使人歌舞佚乐，

无所不至，要在于不失正焉而已矣。虽然，圣人固有所甚畏也。一失容者，礼之所由废也。一失言者，义之所由亡也。君臣之相攘，上下之相残，天下大乱，未尝不始于此道。是故《春秋》力争于毫厘之间，而深明乎疑似之际，截然其有所必不可为也。不观于《诗》，无以见王道之易。不观于《春秋》，无以知王政之难。

自孔子没，诸子各以所闻著书，而皆不得其源流，故其言无有统要，若孟子，可谓深于《诗》而长于《春秋》者矣。其道始于至粗，而极于至精。充乎天地，放乎四海，而毫厘有所必计。至宽而不可犯，至密而不可察，此其中必有所守，而后世或未之见也。

且孟子尝有言矣：“人能充其无欲害人之心，而仁不可胜用也。人能充其无欲为穿窬之心，而义不可胜用也。士未可以言而言，是以言诘之也。可以言而不言，是以不言诘之也。是皆穿窬之类也。”唯其不为穿窬也，而义至于不可胜用。唯其未可以言而言、可以言而不言也，而其罪遂至于穿窬。故曰：其道始于至粗，而极于至精。充乎天地，放乎四海，而毫厘有所必计。呜呼，此其所以为孟子欤！后之

观孟子者，无观之他，亦观诸此而已矣。

### 【译文】

古时的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，搜集了夏商周三代的旧闻，汇集经、礼三百卷，曲礼三千，但是直到他临终也没有完成他的学说。孔子对子贡说：“你说，你是不是认为我是学识多而见识广的人呢？其实不是，我只是一个坚持一贯的人。”天下人都怜悯他屡遭苦难而始终没有得到重用，不知道这位夫子坚持一贯的态度。所以，尧、舜、大禹、商汤、周文王、周武王、周公的法度、礼乐和刑政，跟当世的贤人君子、诸子百家的书籍，各种工匠的技艺，九州之内，四海以外，周边九夷八蛮的事情，以及荒诞不经而又难以考证的事情，混然都汇集在心中，而具有卓越才智不会混乱的人，这就是有一定之规。这所以博学而不混乱，深思而不受迷惑，如果不是对天下学问达到致诚致精的地步，有谁能够达到这个境地呢？

大凡曾经潜心研究六经的人，只有读懂了《诗经》与《春秋》之后，才能够知道圣人的道理，事物的开始、结束和本末，各有一定的规律。匡正行为和教化人民的根本，就是要从天下人容易做的事开始。天下人都知道父子关系。父子不互相侵害，就足以形成敬孝老人的风气；天下人都知道有兄弟之情，兄弟之间不相互掠夺，这就足以形成“悌”的民风。孝悌这种民风浓厚了，建立王道的条件就具备了。这些道理本来并不深远或难以理解，也不是什么需要付出很大辛苦而难以做到的。所以《诗经》作为教化民众的作用，是教会人们歌舞娱乐，无所不会，重要的在于不要失去正派的风范。虽然，圣人本

来对此也是有所担心的，因为一旦失去节制，礼仪就会由此而废。一旦胡言乱语，仁义就会由此而丧失。君臣之间相互对抗，上下之间相互残杀，天下必定大乱，其中原因未必不是因为这种乐道（指歌舞娱乐）。所以，《春秋》一书努力在细微的事件之间，深刻揭示历史的是非疑惑，深刻剖析了历史上一些绝对不可重演的行为。不看《诗经》就不会明白建立王道的容易；不看《春秋》就不会知道建立王政的艰难。

自从孔子逝世之后，诸子百家各自利用他们的见闻著书立说，而都没有真正把握孔子学说的源流，所以他们的言论有没有都不重要。可是像孟柯，可以说是深刻理解了《诗经》而又专长研究《春秋》的人。他讲的道理从粗浅之处开始，而在细微之处达到了极点。宏大到天地之间、传播于四海之内，毫厘之间的细微事物都有所论述。相当的广泛而没有出现漏洞，相当的细密而不能出现谬误，这其中必定有他一定的信念，而后世学者们可能还没有理解。

而且孟子曾经说过：“每个人都能够怀着一颗没有私欲、不去害人的善良之心，这个世道上的仁德就可以用不完了。每个人都能够怀着一颗没有私欲和穿墙偷盗之心，世间的义也就用不完了。士大夫们说一些自己不该说的话，是为了用这些话诱取某些利益；而有些该说的话不说，是以这种不说话的方式得到利益。这都是类似偷窃的行为。”唯有不为得到私利而言行，世间的“义”才能成为不可用尽的财富。唯有世人们都认为那些爱说不该说的话或者该说的话不说的人，其罪孽与偷盗一样。所以说：孟子的道理开始于非

常粗浅的常识，而在精密之处又达到极点。充满天地之间，传播于四海之内，而毫厘之间的细微事物都有所论述。呜呼，这正是他之所以成为亚圣孟子的道理！后世研究孟子的人，不研究其他的方面，也必须重视这一领域。

## 乐毅论

自知其可以王而王者，三王也。自知其不可以王而霸者，五霸也。或者之论曰：“图王不成，其弊犹可以霸。”呜呼！使齐桓、晋文而行汤、武之事，将求亡之不暇，虽欲霸，可得乎？

夫王者，不可以小用也。大用则王，小用则亡。昔者徐偃王、宋襄公尝行仁义矣，然终以亡其身、丧其国者，何哉？其所施者，未足以充其所求也。故夫有可以得天下之道，而无取天下之心，乃可与言王矣。范蠡、留侯，虽非汤、武之佐，然亦可谓刚毅果敢，卓然不惑，而能有所必为者也。观吴王困于姑苏之上，而求哀请命于勾践，勾践欲赦之，彼范蠡者独以为不可，援桴进兵，卒刎其颈。项籍之解而东，高帝亦欲罢兵归国，留侯谏曰：“此天亡也，急击勿失。”此二人者，以为区区之仁义，不足以易吾之大计也。

嗟夫！乐毅战国之雄，未知大道，而窃尝闻之，则足以亡其身而已矣。论者以为燕惠王不肖，用反间，以骑劫代将，卒走乐生。此其所以无成者，出于不幸，而非用兵之罪。然当时使昭王尚在，反间不得行，乐毅终亦必败。何者？燕之并齐，非秦、楚、三晋之利。今以百万之师，攻两城之残寇，而数岁不决，师老于外，此

必有乘其虚者矣。诸侯乘之于内，齐击之于外。当此时，虽太公、穰苴不能无败。然乐毅以百倍之众，数岁而不能下两城者，非其智力不足，盖欲以仁义服齐之民，故不忍急攻而至于此也。夫以齐人苦湣王之暴，乐毅苟退而休兵，治其政令，宽其赋役，反其田里，安其老幼，使齐人无复斗志，则田单者独谁与战哉！奈何以百万之师，相持而不决，此固所以使齐人得徐而为之谋也。

当战国时，兵强相吞者，岂独在我，以燕、齐之众压其城，而急攻之，可灭此而后食，其谁曰不可。呜呼！欲王则王，不王则审所处，无使两失焉而为天下笑也。

### 【译文】

春秋时期，自己知道能够称王而实际称王的人，有三位。自己知道其不能够称王而实际成一代霸业的人物，就是春秋五霸。有人曾经这样论说：“试图称王不成，他们的势力足以使他们称霸。”哎呀！让历史上的齐桓公、晋文公去做商汤和周武王那样的事情，那岂不是让他们闲着没事自寻灭亡，虽然心想着称霸，是否能够成功呢？

自古追求王道的人，不能以小小的仁义而失去称王的大计。从大处着眼就可以称王，因小失大就会灭亡。古代的徐偃王和宋襄公曾经注意推行仁义之政，但是最终招致了自身灭亡、丧失自己的国家，这是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他们所实行的政策，不能满足他们所要追求的目的。所以要有得到统治天下的措施，而不能有取得天下的野心，这样就可以称王。春秋时越国大夫范蠡和西汉留侯张良，虽然不是辅佐商

汤、周武的大臣，但也可以说是刚毅果敢的人物，非常卓越而遇事头脑清醒，能够有所作为。观看春秋时代吴王夫差被困在姑苏城上，而哀求越王勾践饶他性命，勾践曾经想赦免他一死，当时只有范蠡一人认为不可，坚持驾着木筏继续进兵，最终攻克姑苏城使吴王刎颈而死。楚汉之争的时候项籍突破重围而向东败逃，汉高帝也曾经想罢兵西归，可是张良上谏说：“这是苍天要灭亡项羽，应该加急追击莫失良机。”这两个历史人物，都认为以小小的仁义，不足以改变我的军国大计。

唉！乐毅作为战国时期的一员雄才，没有弄明白称王的这些大道理，我曾经听说，他完全可能给自己招致杀身之祸。有人认为燕惠王属于不肖之徒，相信了齐国的反间之计，派骑劫代替乐毅充当主将，使乐毅被迫离开燕国。这为乐毅之所以不能取得伐齐的成功，完全是历史的不幸，而不是他用兵指挥的过错。但是，当时假如燕昭王还在世，即使齐国的反间计不能得逞，乐毅也终究会失败。这又是为什么呢？因为燕国击并齐国，不能得利于秦、楚和晋国三国。当时的乐毅以百万军队攻击齐国两座城垣的残余败兵，而用了几年的时间不能取胜，军队年老在外，这就造成必定会有薄弱环节使敌方有机可乘。诸侯在内部作乱，齐国在外面攻击，到了这种时刻，就是姜太公、穰苴也不能不败。然而，乐毅率领百倍于敌人的兵力，连续几年而攻不下两座城池，并不是他的智力和能耐不够，而是因为他企图用仁义来征服齐国的百姓，所以不忍心采取急攻战略而导致这样的结果。当时齐国人民本来对齐湣王的暴虐深感困苦，乐毅还不如姑且退兵休养生息，在齐国整顿政令，减少百

姓的赋役，让百姓到田里耕种，安顿老幼，使得齐国人丧失斗志，则田单之辈又利用谁随他去作战呢！那又怎么会劳顿百万军队，相持数年不能取胜呢，这正是让齐国得到片刻喘息而反过来采取离间阴谋的原因。

战国时期，因为兵力强大而互相吞并的诸侯，岂止一家，以燕国和齐国的军队围攻一两座城池，而加紧攻击，完全可以攻克之后再去看吃饭，这种战术谁说不可行。哀咳！想称王就称王，不想称王就审时度势，不能使得两头都失去而让天下人讥笑。

## 荀卿论

尝读《孔子世家》，观其言语文章，循循莫不有规矩，不敢放言高论，言必称先王，然后知圣人忧天下之深也。茫乎不知其畔岸，而非远也；浩乎不知其津涯，而非深也。其所言者，匹夫匹妇之所共知；而所行者，圣人有所不能尽也。呜呼！是亦足矣。使后世有能尽吾说者，虽为圣人无难，而不能者，不失为寡过而已矣。

子路之勇，子贡之辩，冉有之智，此三者，皆天下之所谓难能而可贵者也。然三子者，每不为夫子之所悦。颜渊默然不见其所能，若无以异于众人者，而夫子亟称之。且夫学圣人者，岂必其言之云尔哉？亦观其意之所向而已。夫子以为后世必有不能行其说者矣，必有窃其说而为不义者矣。是故其言平易正直，而不敢为非常可喜之论，要在于不可易也。

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，既而焚灭其

书，大变古先圣王之法，于其师之道，不啻若寇仇。及今观荀卿之书，然后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于荀卿，而不足怪也。

荀卿者，喜为异说而不让，敢为高论而不顾者也。其言愚人之所惊，小人之所喜也。子思、孟轲，世之所谓贤人君子也。荀卿独曰：“乱天下者，子思、孟轲也。”天下之人，如此其众也；仁人义士，如此其多也。荀卿独曰：“人性恶。桀、纣，性也。尧、舜，伪也。”由是观之，意其为人必也刚复不逊，而自许太过。彼李斯者，又特甚者耳。

今夫小人之为不善，犹必有所顾忌，是以夏、商之亡，桀、纣之残暴，而先王之法度、礼乐、刑政，犹未至于绝灭而不可考者，是桀、纣犹有所存而不敢尽废也。彼李斯者，独能奋而不顾，焚烧夫子之六经，烹灭三代之诸侯，破坏周公之井田，此亦必有所恃者矣。彼见其师历诋天下之贤人，自是其愚，以为古先圣王皆无足法者。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时之论，而荀卿亦不知其祸之至于此也。

其父杀人报仇，荀卿明王道，述礼乐，而李斯以其学乱天下，其高谈异论有以激之也。孔、孟之论，未尝异也，而天下卒无有及者。苟天下果无有及者，则尚安以求异为哉！

## 【译文】

曾经读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，观察他所有的语言文章，都无不是循规蹈矩，往往不敢放开发表言论，说话必定要先称先王如何如何，由此可以知道他作为圣人作为天下黎民深深忧虑的情怀。茫然不知道这苦海的岸畔，其实并不遥远。浩淼而不知道他渡过的渡口，其实并不太深。他所说

的一些道理，连一般没知识的农夫和村妇人人都知道。但是他的行动，说明圣人也有不能做尽的事。唉咳！这也就足够了。使后世的人们有可能做圣人没做完的事。虽然是圣人而不怕困难，但也有不能做的事，这不能不说是小小的过错而已。

子路的勇敢，子贡的善辨，冉有的智慧，这三者，都是天下人认为难能可贵的。但是，这三个人物，经常不被孔子喜欢。颜渊喜欢沉默看不出他有什么能耐，好像与一般众人没有什么区别，而孔子非常赞赏他。而且后世学习孔圣人的人们，岂不是都要先学会他的言论再学其他贤人的言论？也是为了观察他心意中所向往的东西。孔子认为后世必定会有否定他学说的人，也必定会有人曲解他的学说而做不义的事。所以他的话正直而又平易近人，而不敢用非常令人喜欢的高论，重要的就在于不能随便篡改。

过去，常有人怪罪李斯因为曾经师从于荀卿，所以随后参与了秦始皇“焚书坑儒”的活动，大肆改变古代圣明君王的法度，论述他（荀卿）的为师之道，不只是将他与贼寇相比。如今再看荀匡的著作，然后就明白了李斯为什么到秦国为官，确实是因为他的老师荀匡，这就不足为怪了。

荀卿其人，喜欢创立标新立意的学说而不善于谦让，敢于创立高论而不顾后果。他的话愚蠢的人为之震惊，贪图小利的小人为之欣喜。子思、孟柯，世人所说的贤人君子。唯有荀卿认为：“搞乱天下的人，就是子思、孟柯之辈。”天下的人，如此众多，天下的仁人义士，也是如此的多。而唯有荀卿认为：“人性的险恶。夏桀、殷纣王，正是人的本性所使

然；而尧、舜等明君，实际上是一种伪装。”从这方面来看，他的为人也必定是刚愎自用、桀傲不逊。而对自己放纵太过。他的弟子李斯，又在这方面特别突出。

如今小人干一些恶劣的事情，有时还必定要有所顾忌，因为有夏商两朝灭亡的历史教训，桀、纣的残暴，也没有使过去贤明帝王的法度、礼乐、刑政达到灭绝而不能查考的地步，即使桀、纣时代也还仍然保留了一些法度、礼乐而不敢全部废弃。而唯有这个李斯其人，能够奋起而不顾一切，焚烧孔子的六经，诛灭三代诸侯，破坏周公的井田制，这种胆大妄为必定是有所依仗。看他的老师荀卿谩骂天下的贤人，自然是一种愚蠢的行为，认为古代圣明的帝王都不足以效法。不知道荀卿他乘一时痛快发表的言论，而自己也不知道遗留的灾祸竟达到这般地步。

他的父亲杀人报仇，荀卿则明白王道法度，讲述礼乐，而李斯则利用他的学说搞乱天下，他的高深怪诞的言论发挥了激发李斯的作用。孔孟的言论，没有标新立意，而天下还没有能够与之相比的。荀卿的言论真是天下没有可以相比的，就是始终坚持以标新立异为目标。

## 韩非论

圣人之为恶夫异端尽力而排之者，非异端之能乱天下，而天下之乱所由出也。昔周之衰，有老聃、庄周、列御寇之徒，更为虚无淡泊之言，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说，纷纭颠倒，而卒归于无有。由其道者，荡然莫得其当，是以忘乎富贵之乐，

而齐乎死生之分，此不得志于天下，高世远举之人，所以放心而无忧。虽非圣人之道，而其用意，固亦无恶于天下。自老聃之死百余年，有商鞅、韩非著书，信治天下无若刑名之贤，及秦用之，终于胜、广之乱，教化不足，而法有余，秦以不祀，而天下被其毒。后世之学者，知申、韩之罪，而不知老聃、庄周之使然。

何者？仁义之道，起于夫妇、父子、兄弟相爱之间；而礼法刑政之原，出于君臣上下相忌之际。相爱则有所不忍，相忌则有所不敢。夫不敢与不忍之心合，而后圣人之道得存乎其中。今老聃、庄周论君臣、父子之间，泛泛乎若萍浮于江湖而适相值也。夫是以父不足爱，而君不足忌。不忌其君，不爱其父，则仁不足以怀，义不足以劝，礼乐不足以化。此四者皆不足用，而欲置天下于无有。夫无有，岂诚足以治天下哉！商鞅、韩非求为其说而不得，得其所以轻天下而齐万物之术，是以敢为残忍而无疑。

今夫不忍杀人而不足以为仁，而仁亦不足以治民；则是杀人不足以为不仁，而不仁亦不足以乱天下。如此，则举天下唯吾之所为，刀锯斧钺，何施而不可。昔者夫子未尝一日敢易其言。虽天下之小物，亦莫不有所畏。今其视天下眇然若不足为者，此其所以轻杀人欤！

太史迁曰：“申子卑卑，施于名实。韩子引绳墨，切事情，明是非，其极惨核少恩，皆原于道德之意。”尝读而思之，事固有不相谋而相感者，庄、老之后，其祸为申、韩。由三代之衰至于今，凡所以乱圣人之道者，其弊固已多矣，而未知其所终，奈何其不为之所也。

## 【译文】

圣人之所以尽力排除世间恶人和各种异端邪说，并不是异端邪说能够招致天下大乱，而是天下的动乱往往由此引起。过去周朝的衰亡，有老子李耳、庄周、列子（列御寇）等人，更有虚无空谈淡泊的言论，而学习研究他们这些猖狂浮游学说的人们，人众纷纭神魂颠倒，而都归于虚无。按照他们的学说和思想行事的人，全都没有得到适当的手段，往往忘记富贵的欢乐，而混淆生死的区分，这都是一些不得志的人，和一些高踞权贵地位或远离尘世的人，所以他们放心空谈而没有忧愁。虽然不是圣人的学说，但是如果采用他们的主张，其实也不会对社会产生恶劣的影响，自从老子李耳死去一百多年，产生了商鞅、韩非著书立说，相信治理国家之法都不如用刑罚为最好，到了秦国任用他们之后，终于导致了陈胜、吴广起义，对民众教化不够，而刑法有余，秦朝短命，而天下民众深受其害。后世的学者们，都知道申不害、韩非的罪孽，而不知道实际上是老子、庄子使他们这样做的。

为什么呢？仁义之道，最先起源于夫妻、父子、兄弟之间的相互关爱；而礼法行政的渊源，则出于君臣上下相互猜忌的关系。相爱就会有所不忍，相互猜忌就会有所不敢。将不敢的心思和不忍的心思融合起来，后来圣人之道就产生于其中。如今老子、庄子论述君臣、父子之间的关系，泛泛地就像浮萍对于江湖那样的价值。就是说父亲不足以爱，而君主不足以畏忌。不畏忌君主，不热爱父亲，则仁爱之心不能存于怀，义也不能得到劝诱，礼乐不能得到教化。这四者都不能用了，而

使得天下什么也没有了。既然天下成为无有，难道还能治理天下吗！商鞅、韩非追求老子、庄子的学说而没得到真谛，反而得到了轻视天下而蔑视万物的技术，所以敢于行使最残忍的手段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

如今，不忍心杀人而不足以为仁者，而仁者也不能够治理民众；于是杀人也不是不仁，而不仁也不足以搞乱天下。正因为如此，就可以拿着国家和民众为我所用，刀锯斧钺，有什么不能使呢。过去孔夫子没有一天敢改变他的言论。虽然天下的一些微小事物，也不敢不有所顾及。而到了他们手里，看天下什么都微不足道，这正是他们敢于轻易杀人的原因。

太史公司马迁说：“申子（申不害）以卑微出身，主张对于官吏要以所任的职务授予官职，按照官名落实责任。韩非子则重视立规矩，切时弊，讲明是非，他非常残忍而很少施恩，都是来源于老子道德经的原意。”我曾阅读后思考，事情本来不是相互谋算而应该是相互感悟，庄子、老子之后，灾祸在于申子、韩非子。自从夏商周三代衰落以后到现在，凡是搞乱圣人之道的人，其弊端本来有很多，而不能知道他们的结果，就是他们的主张不得法。

## 留侯论

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，必有过人之节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，匹夫见辱，拔剑而起，挺身而斗，此不足为勇也。天下有大勇者，卒然临之而不惊，无故加之而不怒，此其所挟持者甚大，而其志甚远也。

夫子房受书于圯上之老人也，其事甚怪，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，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？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，皆圣贤相与警戒之意。而世不察，以为鬼物，亦已过矣。且其意不在书。当韩之亡，秦之方盛也，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，其平居无罪夷灭者，不可胜数，虽有贲、育，无所复施。夫持法太急者，其锋不可犯，而其势未可乘。子房不忍忿忿之心，以匹夫之力，而逞于一击之间。当此之时，子房之不死者，其间不能容发，盖亦已危矣。千金之子，不死于盗贼，何者？其身之可爱，而盗贼之不足以死也。子房以盖世之才，不为伊尹、太公之谋，而特出于荆轲、聂政之计，以侥幸于不死，此圯上之老人所为深惜者也。是故倨傲鲜腆而深折之。彼其能有所忍也，然后可以就大事。故曰：孺子可教也。

楚庄王伐郑，郑伯肉袒牵羊以逆。庄王曰：“其君能下人，必能信用其民矣。”遂舍之。勾践之困于会稽而归，臣妾于吴者，三年而不倦。且夫有报人之志，而不能下人者，是匹夫之刚也。夫老人者，以为子房才有余，而忧其度量之不足，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，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。何则？非有生平之素，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间，而命以仆妾之役，油然而不怪者，此固秦皇之所不能惊，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。

观夫高祖之所以胜，而项籍之所以败者，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。项籍唯不能忍，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。高祖忍之，养其全锋而待其毙。此子房教之也。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，高祖发怒，见于词色。由此观之，犹有刚强不忍之气，非子房其谁全之。

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，而其状貌乃如妇人女子，不称其志气。呜呼，此其所以为子房欤！

### 【译文】

古代那些被称为英雄豪杰的人物，一定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操守。人的性情对有些事是不能容忍的，普通百姓受到污辱，就会拔剑相向，挺身与人相斗，这不能算是勇敢。世间有具备至高至大勇气的人。突然遇到侮辱而不惊慌，无缘无故地被侮辱而不表示愤怒，这是因为这种人有极大的报负，至于他的志向就更远大了。

张良（字子房）在桥上接受圯上老人的兵书，这事（看上去）很奇怪；但是我们怎么知道圯上老人不是秦代的一位隐士，到市井中来试试张良（的度量）的呢？从他的行动微微露出的用意来看，都含有圣者贤者相互警戒的意思。但是世上之人不明白，以为他是鬼怪，这已太过分了。况且老人的用意并不在于给张良一本兵书。当韩国（被秦国）灭亡、秦国正强大之时，秦始皇用刀、锯、鼎、镬这些酷毒的刑罚来对待世间的读书人，老老实实在家中没有犯罪而被灭族抄斩的人，多得数也数不清。即使有像孟贲、夏育这样的勇士，也没有施展本事的地方。在法令最严厉的时候，其锋芒是不可抵挡的，而执法严峻的高峰过去后，就有可利用的机会。（当初）张良忍不住愤怒的心情，用普通百姓的勇力，盲目狙击（秦王），逞一击之勇。而在那个时候，张良之所以没有死，也就是因为生与死还有那么不到一根头发丝大小的距离，这已经算十分危险了。富贵人家的子弟，不能因为做盗贼而死，为了什么呢？（这是因为）他们的

身体、生命是很可宝贵的，做盗贼而死是不值得的。张良以其盖世的才能，不去用伊尹、吕尚辅君安国的谋略，而仅仅像荆轲、聂政那样去做行刺之事，只是因为侥幸而没有死掉，这本来是圯上老人替他深为惋惜的地方，因此使用傲慢无礼的态度来狠狠地攫辱他，使张良能够有所忍耐，然后才能够做成大事，所以（后来圯上老人对张良）说：“你这个孩子是可以教育成材的。”

楚庄王进攻郑国，郑襄公袒衣露体（准备接受责打或杀戮）、牵着羊迎接楚庄王，楚庄王说：“郑国的君王（既然）能屈居于人下，（那么也）一定能够信任、使用他的民众。”于是退兵。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围困在会稽，后来到吴国作奴仆，三年没有倦怠。那些有报仇雪恨的志向，但不能居人之下的人，只不过是普通百姓的刚强。那位圯上老人，认为张良才能有余，担心他度量不够，所以才狠狠地摧折张良那种年轻人的刚锐之气，使他能够忍耐那些使人愤怒的事，而成就大的谋略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（圯上老人和张良）并不是一向了解，突然在民间相遇，（老人）却让张良做奴仆做的事，（张良能）和顺（地接受）不以为怪，这当然是秦始皇不能使他惊恐、项羽不能使他发怒的胸襟啊！

看看汉高祖刘邦所以能取得胜利、而项羽所以失败的原因，就在于能忍耐和不能忍耐的不同而已。正因为项羽不能忍耐，虽然他百战百胜，但很轻率地使用了他的精锐力量；汉高祖刘邦因为能忍耐，就能保存他的精锐力量，等待项羽衰毙之时，这是张良教给刘邦的办法。当淮阴侯韩信破齐国想要自立为齐王时，高祖大为

愤怒，表现在言语中、显现在脸上。从这里可以看出，高祖尚且在性格刚烈不能忍的脾气，不是张良（的劝阻），谁能成全他的事业？

太史公司马迁对张良有些疑虑，总以为张良应该是个魁梧高大的男子汉，（没想到）张良像个妇人或大姑娘，和他的志向、气度不相称。但我却认为这也许正是张良之所以成为张良的原因吧！

## 贾谊论

非才之难，所以自用者实难。惜乎！贾生王者之佐，而不能自用其才也。

夫君子之所取者远，则必有所待；所就者大，则必有所忍。古之贤人，皆负可致之才，而卒不能行其万一者，未必皆其时君之罪，或者其自取也。

愚观贾生之论，如其所言，虽三代何以远过？得君如汉文，犹且以不用死，然则是天下无尧舜，终不可以有所为耶？仲尼圣人，历试于天下，苟非大无道之国，皆欲勉强扶持，庶几一日得行其道。将之荆，先之以冉有，申之以子夏。君子之欲得其君，如此其勤也。孟子去齐，三宿而后出昼，犹曰：“王其庶几召我。”君子之不忍弃其君，如此其厚也。公孙丑问曰：“夫子何为不豫？”孟子曰：“方今天下，舍我其谁哉？而吾何为不豫？”君子之爱其身，如此其至也。夫如此而不用，然后知天下果不足与有为，而可以无憾矣。若贾生者，非汉文之不能用生，生之不能用汉文也。

夫绦侯亲握天子玺而受之文帝。灌婴连兵数十万，以决刘吕之雌雄，又皆高帝

之旧将。此其君臣相得之分，岂特父子骨肉手足哉？贾生，洛阳之少年，欲使其一朝之间，尽弃其旧而谋其新，亦已难矣。为贾生者，上得其君，下得其大臣。如绛、灌之属，优游浸渍而深交之，使天子不疑，大臣不忌，然后举天下而唯吾之所欲为，不过十年，可以得志。安有立谈之间，而遽为人痛哭哉！观其过湘为赋以吊屈原，纡郁愤闷，赳然有远举之志。其后卒以自伤哭泣，至于天绝，是亦不善处穷者也。夫谋之一不见用，则安知终不复用也？不知默默以待其变，而自残至此。呜呼！贾生志大而量小，才有余而识不足也。

古之人，有高世之才，必有遗俗之累。是故非聪明睿哲不惑之主，则不能全其用。古今称苻坚得王猛于草茅之中，一朝尽斥去其旧臣而与之谋。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，其以此哉！愚深悲贾生之志，故备论之。亦使人君得如贾生之臣，则知其有狷介之操，一不见用，则忧伤病沮，不能复振。而为贾生者，亦谨其所发哉！

### 【译文】

一个人有才能并不难，难的是怎样运用自己的才华。可惜呀！以贾谊的才能可以辅佐国君，但是他不会运用自己的才能。

有才学的人要实现远大的抱负，就一定要等待时机；要想取得很大的成就，就必须有所忍耐。古代有德行的人，都有建功立业的才能，而其中万一不能施展他们的才能，不一定是当时国君的过错，有的是他们自己造成的。

我看贾谊的言论，正如他自己所说的，即使是夏、商、周三代的办法怎能远

远地超过他呢？他遇到了像汉文帝这样的国君，尚且不能施展自己的才华、郁郁而死，难道天下没有像尧、舜这样的贤君，就不可能有所作为了吗？仲尼（孔子）是一个圣人，遍游诸侯国推行他的主张，只要不是非常无道的国家，都想勉强去扶持它，希望有一天能实行他的主张。他要到楚国去应聘，叫冉有先去表明自己的意思，又派子夏重述他的愿望。有才德的人想要得到自己理想的国君，用心是这样勤苦。孟子离开齐国，却在昼地住了三天才离开，还说：“齐王也许会召我回去的。”孟子不忍心离开他的国君，其意是这样的深厚。公孙丑问道：“先生为什么不开心呢？”孟子说：“现在的天下，除了我，还有谁能治理好呢？我有什么不开心的？”有才德的人爱护自己，是这样的周到。要是这样还不能施展才华，那么就明白天下真的不能有所作为，这样也就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。像贾谊这样的人，不是汉文帝不能重用他，而是贾谊不能做好汉文帝的臣子。绛侯周勃亲自捧着天子的玉玺献给汉文帝，灌婴联合兵力几十万，为刘家王朝与吕氏势力决一胜负，他们都是汉高帝之时的旧将。这是君与臣相知相信的缘分，难道只是父子兄弟之间才有的吗？贾谊只是洛阳的一个青年，要想让汉文帝全部撇开旧制度而考虑他提出的新主张，这也是很难的。对于贾谊来说，应该上面取得国君的信任，下面得到众大臣的拥护。像周勃、灌婴等人，从容不迫地渐渐与其他人深交，使皇帝对他不怀疑，使大臣不猜忌，然后才能让天下都按我想的那样去发展，不用十年，他的志向就可以实现了。哪里能在短时间内，突然痛哭流涕地向皇帝提出那么多问题呢？读他经过

湘江而凭吊屈原的赋文，忧郁愤懑，跃跃然有退隐之志，此后终于自伤怀才不遇、悲哀哭泣，以至于早死，这也是不善自立于不得志的境遇。自己的主张起初得不到采用，怎能知道始终不被采用呢？贾谊不知道沉默等待时势之变，却如此自残生命！唉，贾谊志向远大但度量太小，才华有余但见识不足啊！

古代的人，有盖世之才，就一定会害怕被人遗弃的忧虑。因此要不是英明有远见的国君，就不能完全施展他的才能。古

人今人都称道苻坚起用隐居草野的王猛、一时全部斥退了旧臣而独独与王猛商量国事。苻坚不过是一个才能平庸的人，却能夺取一半天下，大概是因为这个缘故吧。我深深地为贾谊的志向而悲哀，因此详细地谈论他。也想要国君得到了像贾谊这样的大臣，就应知道他们有正直清高的节操，一旦不被重用，他们就会忧伤颓废，再也振作不起精神来。而作为像贾谊这样的人，也应该谨以贾谊立身处世之法为戒啊！

# 苏轼文集卷四十四

## 论

### 大臣论下

天下之权，在于小人，君子之欲击之也，不亡其身，则亡其君。然则是小人者，终不可去乎？闻之曰：迫人者，其智浅；迫于人者，其智深。非才有不同，所居之势然也。古之为兵者，围师勿遏，穷寇勿追，诚恐其知死而致力，则虽有众无所用之。故曰：“同舟而遇风，则胡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。”小人之心，自知其负天下之怨，而君子之莫吾赦也，则将日夜为计，以备一旦卒然不可测之患；今君子又从而疾恶之，是以其谋不得不深，其交不得不合。交合而谋深，则其致毒也忿戾而不可解。

故凡天下之患，起于小人，而成于君子之速之也。小人在内，君子在外。君子为客，小人为主。主未发而客先焉，则小人之词直，而君子之势近于不顺。直则可以欺众，而不顺则难以令其下。故昔之举事者，常以中道而众散，以至于败，则其理岂不甚明哉？

若夫智者则不然。内以自固其君子之

交，而厚集其势；外以阳浮而不逆于小人之意，以待其间。宽之使不吾疾，狃之使不吾虑，啖之以利，以昏其智，顺适其意，以杀其怒。然后待其发而乘其隙，推其坠而挽其绝。故其用力也约，而无后患。莫敢为之先，故君不怒而势不逼。如此者，功成而天下安之。

今夫小人急之则合，宽之则散，是从古以然也。见利不能不争，见患不能不避，无信不能不相诈，无礼不能不相渎，是故其交易间，其党易破也。而君子不务宽之以待其变，而急之以合其交，亦已过矣。君子小人，杂居而未决，为君子之计者，莫若深交而无为。苟不能深交而无为，则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。昔汉高之亡，以天下属平、勃。及高后临朝，擅王诸吕，废黜刘氏。平日纵酒无一言，及用陆贾计，以千金交欢绛侯，卒以此诛诸吕，定刘氏。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，则是将相相攻之不暇，而何暇及于刘、吕之存亡哉！

故其说曰：将相和调，则士豫附。士豫附，则天下虽有变而权不分。呜呼，知此，其足以为大臣矣夫！

## 【译文】

国家的权利，如果控制在势利小人手中，有贤德的人们就必定要攻击他们，不灭亡他们这些小人，就会使君主灭亡。但是，历代的小人们，最终也不能全部去除吗？我听说：“逼迫人的人，其才智浅陋；受人逼迫的人，才智深沉。并不是才智有所不同，是因为所处的地位所造成的。古代的军事家们都知道，包围敌方军队不能堵死，被打败而溃逃的军队不能穷追，实际就是害怕他们知道必死无疑而奋力求生，导致虽然有众多军队但不能发挥作用。所以说：“同一条船遇到大风时，即使毫无关系的人也能够相互救助，就像亲兄弟一样。”小人的心思，他们自己知道遭到天下人的怨恨，而对于有贤德的人们没有一个肯放过，所以必定会日夜谋划，以防万一突然发生不可预测的变故；如今的君子又都非常疾恶如仇，所以对于打击小人势力的谋略不得不谋划得很深，而他们之间打交道又不得不合作，相互合作而又相互谋算的很深，所以其中的相互毒害相互愤恨也就不能化解。

因此凡是天下的忧患，都是因为小人而引起，而又因为君子们的急促而发生。小人在朝廷之内，君子在朝廷之外。君子是仆从，小人是主人。主人没有先发难而客人先发难，则小人更加有了打击君子的说词，使得君子的势力更加不顺利。小人有了说词则更容易欺骗大众，而君子势力不顺则更加难以限制小人。所以过去那些发动打击小人势力的举事之人，往往导致中途的散伙，以致失败，其中的道理不是非常明白吗？

如果是有才智的人就不会这样。应该

是在内部先巩固自己与有贤德的人们的交情，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；在外部要学会应付而不对抗小人的意志，混入他们中间。宽厚对待他们不至于使他们作为异己痛恨，靠近他们使他们不过多地算计，给他们一些小利，使他们搞昏神志，顺着他们的意志，以消除他们的愤怒。然后等待他们发难而找好他们的薄弱之处，推他们坠落而挽救他们于绝境。因此所用的力量很少，而没有后患。可是不敢在小人之前发难，这就是所谓君主不怒而势力不逼。像这样的人，大功告成而天下安定。

如今小人们形势紧迫就会聚合，形势宽松就会分散，这种德行自古至今就是如此。他们看到有利不能不争，见到有灾祸不能不逃避，没有信誉不能不相互欺诈，没有礼法不能不相互亵渎，所以他们之间的交情只有利益的交易，他们的党朋很容易被破坏。而君子们如果不是在宽松的形势下等待他们内部的变化，而是急于与他们相交苟合，那也是不对的。君子和小人，杂处在一起而没有明确的区分，作为君子的计谋，最好莫过于与大家深交而不求作为。如果不能深交而没有作为，则会导致小人手持把柄而乘机寻找我们君子的间隙。过去汉高帝死后，将天下交给陈平、周勃。到吕后专权，擅自分封吕氏宗亲为王，废黜刘氏诸王。陈平每天酗酒不说一句话，到了关键时刻用陆贾的计谋，利用千金博得绛侯周勃的欢心，遂以此灭掉诸吕，安定刘氏天下。假如这两个人物不互相配合，那就会将相之间相互攻击而没有一点空余时间，哪里还有时间顾及到刘氏、吕氏的存亡大事！

因此，我说：“将相协调和睦，则天下官吏们就会乐于服从。官吏们乐于服

从，则天下虽然有些动乱而大权不会分化。哎呀，能够知道这个道理的人，就足以能够当好大臣了！

## 续欧阳子朋党论

欧阳子曰：“小人欲空人之国，必进朋党之说。”呜呼，国之将亡，此其征欤？祸莫大于权之移人，而君莫危于国之有党。有党则必争，争则小人者必胜，而权之所归也，君安得不危哉，何以言之？君子以道事君，人主必敬之而疏。小人唯予言而莫予违，人主必狎之而亲。疏者易间，而亲者难睽也。而君子，不得志则奉身而退，乐道不仕。小人者，不得志则侥幸复用，唯怨之报。此其所以必胜也。

盖尝论之。君子如嘉禾也，封殖之甚难，而去之甚易。小人如恶草也，不种而生，去之复蕃。世未有小人不除而治者也，然去之为最难。斥其一则援之者众，尽其类则众之致怨也深。小者复用而肆威，大者得志而窃国。善人为之扫地，世主为之屏息。譬断蛇不死，刺虎不毙，其伤人则愈多矣。齐田氏、鲁季孙是已。齐、鲁之执事，莫非田、季之党也，历数君不忘其诛，而卒之简公杀，昭、哀失国。小人之党，其不可除也如此。而汉党锢之狱，唐白马之祸，忠义之士，斥死无余。君子之党，其易尽也如此。使世主知易尽者之可戒，而不可除者之可惧，则有瘳矣。

且夫君子者，世无若是之多也。小人者，亦无若是之众也。凡才智之士，锐于功名而嗜于进取者，随所用耳。孔子曰：“仁者安仁，智者利仁。”未必皆君子也。

冉有从夫子则为门人之选，从季氏则为聚斂之臣。唐柳宗元、刘禹锡使不陷叔文之党，其高才绝学，亦足以唐名臣矣。昔栾怀子得罪于晋，其党皆出奔，乐王鲋谓范宣子曰：“盍反州绰、刑蒯？勇士也”。宣子曰：“彼栾氏之勇也。余何获焉！”王鲋曰：“子为彼栾氏，亦子之勇也。”呜呼，宣子蚤从王鲋之言，岂独获二子之勇，且安有曲沃之变哉！

愚以谓治道去太甚耳。苟黜其首恶而贷其余，使才者不失富贵，不才者无所致憾，将为吾用之不暇，又何怨之报乎！人之所以为盗者，衣食不足耳。农夫市人，焉保其不为盗，而衣食既足，盗岂有不能返农夫市人也哉！故善除盗者，开其衣食之门，使复其业。善除小人者，诱以富贵之道，使隳其党。以力取威胜者，盖未尝不反为所噬也。

曹参之治齐曰：“慎无扰狱市。”狱市，奸人之所容也。知此，亦庶几于善治矣。奸固不可长，而亦不可不容也。若奸无所容，君子岂久安之道哉！牛、李之党遍天下，而李德裕以一夫之力，欲穷其类而致之必死，此其所以不旋踵罹仇人之祸也。奸臣复炽，忠义益衰。以力取威胜者，果不可耶！愚是以续欧阳子之说，而为君子小人之戒。

### 【译文】

欧阳修说过：“小人企图搞垮国家，必定会上奏所谓朋党论。”唉咳！国家将灭亡，这是一种征兆吗？国家的灾祸最大超过不过权利移交给别人，而君王最大的威胁莫过于朝廷内部的朋党。有了朋党必定会产生权利之争，争权夺利的结果往往是小人胜利，而权利归于小人之手，君王岂能不

危险,为什么这么说呢?有贤德的人按照礼义之道辅佐君主,君王必定会敬重他们但保持疏远。小人只要说话必定是没有一句违背君王旨意的,君王必定会非常放纵而与他们亲近。疏远的人容易被离间,而亲近的人则难以看得清除。有贤德的人在不得志的时候就会保持气节而隐退,自得其乐而不再为官;小人们在不得志的时候则总希望侥幸再次得到重用,好得到一个报复怨恨的机会,这正是他们能够得逞的原因。

大概曾经有人论述过:有贤德的人就像优良的庄稼,种植起来非常艰难,而要除掉则非常容易。而那些小人就像丑恶的杂草,不用播种而孳生,铲除之后很快又会长得很壮。世道没有不除掉这些小人而能够达到治理的,可是铲除这些小人最难。斥责其中的一个则声援他的人很多。除掉他们的同类,他们这些人的怨恨也就更深。官小的得以再度重用就会淫威肆虐,官大的得志就会窃取国家大权。善良的人会被扫地出门,君王也被他们要挟的屏住呼吸。就像被砍断的蛇不死,被刺伤的虎没死,他们伤害好人的气势就会更很大。譬如齐国的田氏(田婴之辈)、鲁国的季氏、孙氏就是这种人物。齐国、鲁国当政主事的人,几乎都是田氏或季、孙的党羽,经历了数代君主还不忘记他们被诛的历史。所以发生了齐简公被田成子追杀,鲁昭公、鲁哀公被大夫攻击丧失国家权利的事件。小人的党羽,不能彻底铲除的实例也就如此。而汉朝的党锢之狱,唐朝的白马之灾祸,使得忠义人士被排斥、被杀害几乎没有剩余。说明君子组成的党朋,很容易被除尽也就是如此。这两种实例足以使君主知道容易除尽的应该引以为戒,而不能彻底铲除的小

人们最为可怕,也足以作为教训。

况且君子之人,世上本没有如此太多。而所谓的小人们,也没有如此之众。凡是有才智的人士,很快取得功名而善于进取的人物,随即就被起用了。孔子说:“仁义之人习惯于仁政,智慧之人则利用仁政。”这些人未必都是君子。冉有跟随孔夫子的时候负责门人的筛选,而跟随季氏以后则成为搜罗民财的聚敛之臣。唐代的柳宗元、刘禹锡假如不是陷于王叔文的党朋,他们的高才和盖世学问,也足以成为唐朝名臣。过去春秋时期的栾怀子(栾逞,一作栾盈)在晋国获罪,他的党羽都急忙出逃,乐王鲋对晋国的大夫范宣子说:“何不策反州绰和刑(邢)蒯这二人?他们可是真正的勇士啊!”范宣子说:“那是栾怀子的勇士,我怎么能获得啊!”乐王鲋又说:“你如果像栾怀子那样对待他们,他们也就成了你的勇士。”呜呼,范宣子如果早些听从乐王鲋的意见,不仅能获得二位勇士,而且哪里还会有后来的“曲沃之变”(指栾怀子党羽在曲沃发动叛乱)呢!

我以为治罪之道太严厉了。苟且处治他们的首恶而宽恕其余的人,使得有才智的人不失原有的富贵,没才智的人也没有什么遗憾,所有人才将为我所用而不闲置,他们又有什么可抱怨的呢!一些人们之所以成为盗贼,是因为衣食不足。现在的农夫和商人,又岂能保证他们明天不去当盗贼呢!而一旦衣食充足,盗贼又怎能不会返回来再作农夫或商人呢!所以善于清除盗贼的人,应该开辟解决衣食的门路,使他们恢复自己的正当职业。善于清除小人的人物,要用富贵之道来引诱他们,使他们背叛并搞坏他的党朋。要用武力取得对他们的震慑,大概未必不会反被他们所咬。

曹参治理齐国故地的时候说：“应该谨慎从事，不要轻易干扰监狱和市场。”监狱和市井，是一些奸滑之徒容身之地。知道这一点，也就差不多属于善于执政的人物了。对于奸人固然不能助长他们作虐，但也不能不容他们生存。如果奸人没有容身之地，君子又怎能有长治久安的道理！唐朝的丞相牛僧孺和李宗闵曾经党羽遍天

下，而李德裕靠自己一人的能力，想要全部将他们的朋党至于死地，这正是他不久被仇人排挤招致贬谪之灾祸的原因。奸臣再度得势，忠义之臣的势力进一步衰落。看来试图用威力取得胜利者，果然不可取啊！我以此续写欧阳修先生的学说，而作为对君子和小人的告诫。

## 苏轼文集卷四十七

## 策别 (选)

## 策别三 决壅蔽

所贵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，何也？天下不诉而无冤，不谒而得其所欲，此尧舜之盛也。其次不能无诉，诉而必见察；不能无谒，谒而必见省。使远方之贱吏，不知朝廷之高；而一介之小民，不识官府之难；而后天下治。

今夫一人之身，有一心两手而已，疾痛苛痒，动于百体之中，虽其甚微不足以为患，而手随至。夫手之至，岂其一一而听之心哉？心之所以素爱其身者深，而手之所以素听于心者熟，是故不待使令而卒然以自至。圣人之治天下，亦如此而已。百官之众，四海之广，使其关节脉理，相通为一。叩之而必闻，触之而必应，夫是以天下可使为一身。天子之贵，士民之贱，可使相爱，忧患可使同，缓急可使救。

今也不然。天下有不幸而诉其冤，如诉之于天；有不得已而谒其所欲，如谒之于鬼神。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详悉，而付之于胥吏。故凡贿赂先至者，朝请而夕得；

徒手而来者，终年而不获。至于故常之事，人之所当得而无疑者，莫不务为留滞，以待请属，举天下一毫之事，非金钱无以行之。

昔者汉、唐之弊，患法不明，而用之不密，使吏得以空虚无据之法而绳天下，故小人以无法为奸。今也法令明具，而用之至密，举天下惟法之知。知欲排者，有小不如法，而可指以为瑕；所欲与者，虽有所乖戾，而可借法以为解。故小人以法为奸。今天下所为多事者，岂事之诚多耶？吏欲有所鬻而不得，则新故相仍，纷然而不决，此王化之所以壅遏而不行也。

昔桓、文之霸，百官承职，不待教令而办。四方之宾至，不求有司。王猛之治秦，事至纤悉，莫不尽举，而人不以为烦。盖史之所记；麻思还冀州，请于猛，猛曰：“速装，行矣。”至暮而符下。及出关，郡县皆已被符。其令行禁止，而无留事者，至于纤悉，莫不皆然。苻坚以戎狄之种，至为霸王，兵强国富，垂及升平者，猛之所为，固宜其然也。

今天下治安，大吏奉法，不敢顾私；而府史之属，招权鬻法，长吏心知而不问，以为当然。此其弊有二而已：事繁而